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轍集

一
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

轍

集

第一冊

陳宏天
高秀芳
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轍集/(宋)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8(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0403-2

I.蘇… II.①蘇… ②陳… ③高… III.蘇轍(1039~1112)-文集 IV.I21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30756號

責任編輯:劉尚榮

蘇 轍 集

(全四冊)

陳宏天 高秀芳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1¹/₂印張·1003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2501—5000冊 定價:68.00元

ISBN 7-101-00403-2/I·61

前言

蘇轍，字子由，一字同叔，晚號穎濱遺老。蘇洵之子，蘇軾之弟，眉山（今屬四川）人。生於宋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卒於宋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二二），享年七十四歲。謚「文定」。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與其父兄同時聞名於世，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

蘇轍生活於北宋的中後期。宋王朝立國百年以後，一方面經濟、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沒落也日益顯露出來了。本來宋朝初建時便是「官吏無限員，兵士無限額」，加上又特別優厚官僚，「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宋制祿之厚》）朝廷和地方官府修靡成風，無止境地吞噬着人民創造出的社會財富，極力加重人民的負擔。於是，廣大人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慶曆（一〇四一——一〇四八）以後，接連不斷地發生起義事件，如沂州王倫起義、貝州王則起義、陝西張海、郭邈山起義以及湖南桂陽監瑤族人民的起義。同時，大地主、大商賈也通過各種途徑與朝廷爭奪賦稅、專賣等方面的收入。於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空前激化起來。而外部與契丹、黨項、女真的民族矛盾則始終十分尖銳。

爲挽救宋王朝即將頹敗下去的局勢，各種改良變法的主張便應運而生。朝廷曾採用過某些措施，都未產生過明顯的效果。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神宗起用王安石，開始變法，這次變法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作爲政治家的蘇轍，正是生活在這一歷史環境之中，個人命運自然與這場鬥爭緊密相聯。

蘇轍的少年時代是在家鄉眉山度過的。眉山地處岷、峨之間，「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正是江山秀氣所聚之處。自唐、五代以後，這裏的經濟、文化逐漸繁榮起來。到了宋代已成爲全國雕版印刷事業中心之一。蘇氏家族，據蘇洵的《蘇氏族譜》所載，其遠祖是唐代政治家、文學家蘇味道。蘇味道在武則天在位時做過宰相，中宗以後被貶到眉州作刺史。他的後世便有一支一直在這裏繁衍下來，雖然再也沒有人做過大官，但也不是普通人家。大約到了蘇洵出世前後，家境才逐漸衰微。所以蘇軾與蘇轍自稱「寒族」「賤士」。

蘇氏是世代書香門第。《宋史》說蘇洵二十七歲開始發憤爲學，其實他在少年、青年時代已經讀了不少書。蘇轍的母親程氏夫人是一位很有毅力、並有較高文化教養的婦女。她在丈夫出外遊學期間，獨自擔負起主持家務和教養子女的重擔，曾親自輔助二子學習。（《宋史·蘇軾傳》）蘇轍不如蘇軾聰穎，但刻苦攻讀的精神不亞於其兄。他五六歲時便開始讀書，成年累月足不出戶，簡直到了不辨昏畫的地步。勤奮讀書固然奠定了他堅實的學習基礎，但僅限於苦讀是不可能成爲一代文豪的。可貴的是他在青年時代便已認識到這一點，並採取了補救措施。他概括地說：「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見《樂城集》卷二十二《上樞密韓太尉書》）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同上）

蘇洵在年輕時，曾多次參加科考，均未及第，於是發憤攻讀經史，並把希望寄托於蘇軾與蘇轍，全力哺育他們成才。故蘇轍自謂「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見《樂城集》卷四十八《謝除尚書右丞表》）蘇洵不是一般章句儒生，而是一位有着宏大志向，並且頗具雄才大略的學者。他教授的內容，除經史以外，主要是諸子百家，總是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啓發他們思考天下大事，使他們從懂事時起便樹立治國濟民的雄心抱負。這一點，在蘇轍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從他後來的實踐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觀、歷史觀，同蘇洵完全是一脈相承。

蘇轍與蘇軾自幼在一起長大，同學習，同遊戲，同登進士，同策制舉。蘇洵去世以後，二人更相依爲命。在蘇轍的一生中，蘇軾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們的觀點幾乎完全相同。在創作上，蘇轍處處效法其兄；在各種政治派別的鬥爭中，始終站在一條戰線上。兄弟之間感情極爲深厚，政治命運緊緊聯在一起。正如蘇轍所說：「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見《樂城後集》卷二十《祭亡兄端明文》）「惟我與兄，出處昔同。」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同上，《再祭亡兄端明文》）烏台詩案事起，蘇軾落獄，蘇轍不避嫌疑，不怕牽連，

竭力爲其兄辯解，並表示願效法漢緹縈以身贖父故事，以在身官階替兄贖罪。（見《樂城集》卷三十五《爲兄軾下獄書》）難以忍受的屈辱，使蘇軾痛不欲生；但他想到自己如果含冤死去，蘇轍也必然活不成，便忍辱負重，不惜苟且偷生。在數十年間，二人詩文往來從未間斷，互相贈答、步韻、應和的作品很多。千古傳誦的名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即是蘇軾因懷念子由而作，「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感人的詩句，正表達出他們之間最美好的感情。蘇轍在各方面都推崇其兄，蘇軾對乃弟也是贊譽頗多，甚至有些偏愛。蘇軾曾對人說：「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五《答張文潛書》）《宋史》蘇轍本傳評論道：「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蘇氏兄弟互敬互愛的佳話，確可流芳千古。

在數十年政治生涯中，蘇轍也是幾經浮沉的。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僅十九歲的蘇轍，考中進士。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三月，蘇轍上書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議，深得神宗的賞識，召對延和殿，被任命於制置三司條例司官職。條例司是爲革新而專設的機構，由參知政事王安石主持。但沒過多久，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蘇轍辭官而去。而後差充省試點檢試卷官、陳州教授，出任河南推官。元豐八年（一〇八五）神宗去世，哲宗年幼，由高太后聽政。高太后摒棄新法，起用舊黨。蘇轍被看成是由於反對變法而受排斥的官員，遂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從此，他的官位直線上昇，由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又遷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哲宗親政，開始恢復新法。第二年起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罷蘇轍門下侍郎，

令其出知汝州。此後，他的政治地位一天不如一天，謫居地點也一步步向南推移，最後到達雷州。朝廷上的當權者定要將他置之死地而後快。徽宗繼位以後，以奸臣蔡京爲相，定蘇轍等一百二十人爲「元祐奸黨」，將名字刻於石碑之上，遭到更大的打擊。然而，蔡京等人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變法的旗號，既打擊舊黨，也排斥新黨，大肆搜刮民財，供徽宗和自己肆意揮霍，社會各種矛盾又空前尖銳起來。朝廷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某些緩和矛盾的作法。徽宗曾數次下令大赦天下。這時，蘇轍等人的處境又稍有改善，居處地點又由南向北移，從循州到永州、再到岳州，但仍以待罪之身，受到監視。晚年閑居潁昌十三年，杜門不出，以讀書著述爲樂。

其主要著作，除《樂城集》五十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樂城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外，還有《詩傳》二十卷、《春秋集傳》十二卷、《道德經解》二卷、《古史》六十卷、《龍川略志》十卷、《龍川別志》四卷。

卒於潁昌，與兄軾同葬於汝州郟縣。

二

蘇轍是一位飽讀經史的學者，從政以後不免帶有較濃厚的書生氣。他性情沉靜，爲人耿介，不肯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在混濁的官場中，始終潔身自好，思想品格有不少值得稱道的地方。

蘇轍初登政治舞臺，便以直言敢諫聞名於朝廷內外。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八月，在回答仁宗策問

時，他不顧利害得失，直抒胸臆，十分坦率地指出皇帝留戀後宮、不理朝政而造成種種弊端：「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其後果必然是「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穎濱遺老傳》策入以後，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議，考官知制誥胡宿等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主考官知諫院司馬光却認為唯獨蘇轍的文章才真正表現出愛君憂國之心，應與蘇軾同列三等。最後仁宗裁決說：「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才置之下等。熟悉古史的蘇轍當然懂得「採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會招致什麼後果，但他改變不了「矯拂切直」的習性，還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心裏話。其後在裁減冗員、冗費，增設蘭州、安疆、米脂等砦以防範夏人，爭議回河等一系列問題上，他接連上書，反復陳述自己的看法，決不看風使舵，隨聲附和。這種品性貫穿在一生的始終。

出生於較為清寒的士人家庭的蘇轍，雖也曾一度做過高官，但時間不長，一生大部分時光是在謫居生活中渡過的。因此，他對下層百姓的接觸較多，對他們的疾苦也有所了解。元祐年間（一〇八六——一〇九四），被任命為右司諫，寫出奏狀劄子八十餘篇，其中有相當多一部分是訴說民間疾苦、彈劾地方官吏虐害百姓的。如《乞廢官水磨狀》、《乞葬埋城外白骨狀》、《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乞振救淮南饑民狀》（《樂城集》卷三十七——三十八）等，都旨在為民請命。在《乞放市易欠錢狀》（《樂城集》卷三十九）一文中，他請求免除二百貫以下人戶的市易欠錢，認為這樣做對下層人戶來說可以免

除負擔，對於朝廷來說也損失不大。他分析道：「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所放錢止及二分。」在《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中，他請求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樂城集》卷三十六）他為此哀嘆道：「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同前，《貼黃》）他在《再乞放積欠狀》一文中，又一再催促除放災區的積欠，「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樂城集》卷三十七）類似的例證還可以舉出一些。王安石變法着眼點在富國，增加朝廷的收入；蘇轍的種種建議着眼點在解民於貧困。二者相較，蘇轍更能體諒下層窮苦百姓。那種認定蘇轍為「保守派」、是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謫居期間，他與社會下層各類人物，特別是一般貧民百姓的來往更加頻繁。高安乞丐趙生，弊衣蓬髮、詈罵市人，被看成是「狂人」。蘇轍却和他很要好，一起談論養生之術，言語甚為投契。（見《樂城集》卷二十五《丐者趙生傳》）秦州的禁軍士卒孟德，出其妻子，逃往華山隱居。這在當時一般人看來不過是一個逃兵，蘇轍却認為他是有道者，為他立了傳。實際上這也是揭露北宋兵役制度殘忍腐敗，對於一個受害者寄以滿腔的同情。（同上，《孟德傳》）蘇轍同蘇軾一樣，專愛遊覽名寺古剎，結交寺廟

僧人，同他們談論佛典，爲他們書寫碑文、銘文、祭文，如《閑禪師碑》、《全禪師塔銘》（均見《樂城集》卷二十五）、《祭寶月大師宗兄文》、《祭逍遙聰長老文》。（均見《樂城後集》卷二十）晚年謫居潁昌，同鄰里農夫漁父的來往密切，正是「鄰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留魚一雙」。（《樂城三集》卷三）十月二十九日雪，只是由於「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樂城後集》卷四《九日獨酌》）這種來往受到一定限制。

作爲政治家，蘇轍自有一套主張。他認爲改革弊政，治理天下，應該採用溫和的方式。他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指出凡是採用極端方式治理天下的王朝，都不能維持長久。如秦朝和隋朝都是在戰亂中統一了全國，本來力量是很強大的，但是他們「見天下之久不定也，以是全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令峻法以杜天下之變」。（《應詔集》卷二《隋論》）結果，事與願違，很快就覆亡了。他認爲，這都是因爲沒有隨着國勢的轉變而改變治國的策略。

蘇轍還提出處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應該採用疏導的方法。他把治國比作治水，「唯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變」。（《應詔集》卷六《君術》五）倘能「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那麼「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同上）在評論漢文帝時，他把這一觀點講得更加清楚。他非常贊賞漢文帝「以柔御天下」的策略。當時，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文帝心中瞭然，却不形於色，並賜以禮物，使其怒無以發，亂是以不起。待到景帝掌政，對此不能容

忍，採用晁錯的削藩策，結果激起事變，幾乎釀成天下大亂。蘇轍認為文帝之法可以仿效，景帝之法不足為訓。（《樂城後集》卷七《漢文帝》、《漢景帝》）

蘇轍曾一度兼任戶部侍郎，他對當時社會經濟有比較透徹的了解，看問題也比較實際，能兼顧中小商人、市民及鄉村農戶的某些利益，使他們較為穩定地生活，不致於鋌而走險。他不贊成用增加商稅、擴大禁榷範圍的辦法來解決財政拮据的困難。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裁減各項浮費，做到「費用有節」，「量入為出」（《樂城集》卷四十二《乞裁損浮費劄子》），「上自宗室貴近，下自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同上，《再論裁損浮費劄子》）否則，只從百姓身上刮取財富，等於殺雞取卵。他在《論蜀茶五害狀》一文中，詳細地剖析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葉「虐害四路生靈」的情狀，指出蜀中榷茶有五害：園戶之害、平民之害、省課之害、遞鋪之害、陝西之害。「五害不除，蜀中泣血。」（《樂城集》卷三十六）他認為朝廷要兼顧地方的利益，「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因而請求朝廷將無名封樁之物，諸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均歸之轉運司，「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樂城集》卷四十一《轉對狀》）這些都是切實可行的辦法。

對王安石變法，蘇轍是採取基本否定態度的。但細察他的言行，便可以看出他並非站在舊黨方面反對一切變法措施。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通篇講的都是如何變法。當王安石拿出《青苗書》請他「熟議」時，說道：「有不便，以告勿疑。」蘇轍便以直言相告，他首先肯定新法「救民乏困，非為利也」。同

時指出應該正視這樣的現實：「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人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這些都是實際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新法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看來蘇轍對社會問題的觀察比王安石更爲深入。王安石聽他的議論後也表示：「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宋史》本傳）對免役法，他基本上是贊成的。他曾具體地分析差法與雇法的利弊，如《論差役五事狀》（《樂城集》卷三十七）、《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樂城集》卷四十五）都能切中肯綮。他肯定庸法以免役錢雇用投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差役酬獎，以及召募官員、軍員押綱，使鄉間民戶不復知衙前之苦，使坊郭人戶免去科配之勞。他只是反對在攤派免役錢時，加重處在飢寒境地的下戶的負擔，認爲「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樂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後來，司馬光重新上臺，要罷除一切新法，包括免役法，蘇轍又同他產生了分歧。所以《宋史》評論道：「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這個評價是公正的。

由於政治上屢遭挫折，晚年的蘇轍思想有很大變化，從正統儒家的積極人世精神演化成佛老的消極出世哲學，但這時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也更加清醒。從這首《上元》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緒：「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跼蹐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樂城三集》卷三）詩中表露出孤獨、寂寞、憂鬱、悲憤的情緒，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對腐敗的官場生活感到厭惡。人在苦悶之時總要尋找自我解脫的方法。他

全力養性，栽花種樹給他帶來不少樂趣，讀書佔去大半時光。他陶醉於陶淵明的詩歌辭賦之中，有《和子瞻歸去來辭》、《和子瞻陶淵明停雲詩》、《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這些詩都是蘇軾仿陶淵明之作寫給蘇轍，蘇轍又步韻唱和的作品。他說：「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樂城三集》卷十《遺老齋記》）此話一半是辛酸的悲嘆，一半也是道出實情。

蘇轍本來就喜愛老莊的著作，又讀過不少佛教典籍。晚年他更寄身心於佛道，把二者融會成一體，以佛解老，以老證佛，相互參驗，領會其微言妙道。他說：「困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樂城三集》卷一《丁亥生日》）又說：「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樂城後集》卷二十一《書楞嚴經後》）

三

蘇轍一生中寫作詩歌二千首，散文一千篇，此外還有辭賦多篇。歷來公認，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方面。

蘇轍的散文主要風格是沉靜簡潔，文理自然。在宋初文壇上，出現兩種傾向：一是重道輕文，辭澀言苦；一是空洞浮泛，雕章琢句。歐陽修重整古文運動的旗鼓，蘇氏父子繼起響應，使散文發展形成新的高峰。蘇轍沿着歐陽修等人所開闢的平易自然、條達流暢的路子繼續向前邁進，做出一定的貢獻。明代散文家茅坤評論道：「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疏宕嫻娜處亦自有一片

烟波，似非諸家所及。」（《宋大家蘇文定公文鈔·歷代論評語》）他的散文確實能夠獨自樹立，自成一派。特別是蘇軾、黃庭堅、秦觀等相繼去世以後，蘇轍便成為文壇泰斗。有代表性的散文，主要是書、記、傳、序、論、策和雜說等。

他的記敘性散文，往往給人一種清新明快的感覺。如《武昌九曲亭記》（《樂城集》卷三十四）以瑰麗的筆觸勾勒出建亭的快樂，其中描寫少年時登山浮水的情景，尤其感人，恰如其分地表現適意為悅的主題。《黃州快哉亭記》（同上）夾叙夾議，寫景抒情，紆徐曲折，淺然澹宕。其他如《王氏清虛堂記》、《吳氏浩然堂記》（同上）對「清虛」、「浩然」所發的議論頗為玄妙，《南康直節堂記》（同上）《待月軒記》、《遺老齋記》（《樂城三集》卷十）敘事描寫自然貼切，情與心思俱入佳處。蘇軾說他的文章「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五《答張文潛書》）

他的書啟、奏議一類文章多半很有氣勢。《上樞密韓太尉書》（見《樂城集》卷二十二）提出「文者氣之所形」的觀點。認為「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其途徑是周覽名山大川，廣交天下英雄豪傑。這篇文本本身就寫得很有氣勢，行文如怒馬奔濤，馳騁澎湃於千里之間。與此同時寫的《上兩制諸公書》、《上昭文富丞相書》等均體現少年氣盛，勇銳而不加節制。《上神宗皇帝書》（《樂城集》卷二十一）是他的又一篇代表作。此文專言理財，論證有力，文氣連貫，委婉平和，紆徐謙卑。其中又有許多名言佳句，這才打動了以聖明自詡的神宗皇帝。茅坤評論此文時說道：「凡讀先秦史漢，往往言簡而意盡，固古人所不可及處。及讀子由之文，往往如遊絲之從天而下，嫋娜曲折，氤氳蕩漾，令人讀之情鬯神解

而猶不止，亦非今人所及處。」（《宋大家蘇文定公文鈔》）《答黃庭堅書》、《賀文太師致仕啟》、《賀歐陽少師致仕啟》等文，都是既有風致又很暢達。

宋人的文章多以議論見長。蘇轍所撰的議論文也很出色。其中最精彩的要算謫居嶺南時作的

《歷代論》四十五篇。這一組文章縱論數十位歷史人物的功過得失。一事一論，言簡意深，外質內秀。表面上是談論歷史，實際上都是針對現實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陳述自己的觀點。《賈誼》一文，時而引證，時而議論，渾然一體，不著痕迹。主論賈誼，前引春秋時期晉楚相爭的掌故，後述三國時期魏蜀吳爭鬥的局勢，並以李左車、劉曄、苻堅等上下左右各類人物作為陪襯，引據史實如信手拈來。《六國論》議論精確，筆力遒勁。明人錢穀贊曰：「筆順氣雄，如大鵬鼓翼，天風順發，一息萬里，信文人之巨手也。」（見唐順之編《三蘇文範》）《商論》、《周論》、《荀彧》、《陳蕃》、《李固》、《牛李》以及《應詔集》中《君術》、《臣策》等文，道理精辟，論證有邏輯性。蘇轍熟悉古史，又有多年從政的經驗體會和坎坷的遭遇，所發議論往往切中時弊，不同於一般書生的空洞議論。

蘇轍自少年時起便常常作詩。早年的詩歌具有清淡樸實的風格。《南窗詩》寫雪後景色和書齋生活，情趣高雅，意境恬淡。東坡十分賞識，認為「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見《容齋隨筆》卷十五）《蘇子由詩》經常書寫用以贈送朋友。他在這一時期所作的詩歌，多半以描繪家鄉周圍山川風光為內容，不乏清新活潑的作品，如《江上看山》：「莫行百里一回頭，落日孤雲靄新盡。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如今。」（《樂城集》卷一）抒發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他在詩中還寫到忠州望夫臺、夔州八陣蹟、長江

中的灑灑堆，既平實又見新意。《竹枝歌》反映出長江沿岸人民生活的淒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同前）以民歌式的語言表現楚地的風俗。進入官場以後，生活圈子狹小起來，所寫多半是應答送別之作。但也不乏佳什，許多作品受到當時和後世詩人和詩評家的贊賞。有人還說：他的詩有許多妙處，不是一般人都能領會的。（見方回《瀛奎律髓》）貶官謫居以後，常有反映田園生活、慨嘆農夫樵夫辛勤勞作的作品。《買炭》描繪燒炭老翁的貧苦，夜晚睡破氈，「正晝出無屨」。為何造成這般貧苦？就是因為「御爐歲增貢」。詩人最後感嘆道：「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樂城三集》卷二）讀後令人自然聯想起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另外，從《苦雨》、《春無雷》（同上）等詩中，可以看到作者同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爲風調雨順而歡顏，爲旱澇災荒而擔憂。在晚年作品中，訴說個人處境，並決心保持氣節的作品佔一定分量。《老柏》一詩以柏樹自喻：「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樂城三集》卷二）《自寫真贊》透露出悲憤的情緒：「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樂城後集》卷五）《寄內》則直刺落井下石的小人，感情更爲強烈。「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深居莽中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樂城後集》卷三）感情真切，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蘇轍一生創作詩歌雖然不少，但多半表現個人身邊瑣事，視野不夠開闊，又死守漢儒詩教，不能超出陳腐的舊框框，風格比較拘謹。加上受理學家的影響，強調詩歌應宜揚哀而不怨，安貧樂道的禮教，議論較多，缺少動人的形象和熱情奔放的感情以及鮮明生動的語言，不能很好地發揮詩歌的長處，因